



# 阳光灿烂

□陶灵

五十岁后，我朋友圈子很窄，和外界交往少。身处微信社交大时代，也只加了一个包括我才四个成员的群。以至于前不久，初中时的班主任陈老师去世，我也没有得到消息。还是八月下旬，在苏马荡避暑时，见到居住在云阳老家的小妹妹后，她告诉我的。

高中一年级上学期我便辍学了，不为生计，想捧上所谓的“铁饭碗”，进了一家国营单位工作。教过我的老师虽不多，也有一二十来位，陈老师是我学生时代结束后，唯一有往来的老师。

说来惭愧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已是十多年前的事。那年春节我回云阳，请老师吃肥牛火锅，我母亲作的陪。如今我母亲也“走”了七年。

1978年，初中二年级时，陈老师开始做我班主任，只两年时间。这短短两年中，老师却两次遭遇不幸，或叫灾难。

陈老师家住教学楼底层东边角，位于学校操场坎下。一次体育课时，一高中女生掷铅球不慎，滚到坎下，砸到她头上。当时是砸到还是擦过，作为学生的我不清楚，也没这种概念。但几公斤重的铁球，加上坠落时的冲击力，听起来就恐怖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一想起这事，仍心有余悸。

老师伤愈后搬了家，仍是操场东边角，但到了坎上。这住处与学校公厕一墙之隔，也不属真正的房子，是三楼学生上厕所的过道下，砌砖而成的一个十多平方米的空间。

搬了家，离开可能还会有物品砸头的地方，但并没给老师带来好运。有一天，又传来陈老师家的噩耗，她大儿子悄悄下河游泳，溺水而亡。

不到两年时间，经受两次不幸，这还不是老师不幸的全部……

“你们看，‘黎疯子’又在讲人了。”一次课间休息时，数学老师站在走廊上，望着操场说。不是同情，也没幸灾乐祸，但语气中明显带有厌烦。我抬眼看，一个平头瘦削的中年人站在陈老师屋外的水泥地上，自个儿不停地吵闹，听不清说的什么。

“黎疯子”是陈老师丈夫，患有精神病，间歇发作。听说是他们单位修房子时，一根檩子棒棒打在他头上所致。陈老师教我们第一年里，我很少见到过黎老师——我尊称他老师是有原因的。没见着他的时候，有可能住在精神病院里，也可能在单位上班。少年时的我虽不谙世事，却为陈老师的命运难过。

更没想到的是，陈老师七十多岁时，她的小儿子又因病去世，儿媳妇儿留下一个十来岁的女儿由老师哺育，独自回了福建老家。

读书时，我看到的陈老师，每天脸上都挂着温柔、慈爱的微笑，没有一丝悲伤与哀愁。

我经常被老师留校，有时顺便带我回家，既不耽搁做家务，又好监督我补作业。偶尔会碰到黎老师在家。这时候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，精神很好，样子和蔼可亲，甚至有点“老顽童”的味道，总爱和我吹牛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吹牛的内容早已忘记。但有一天的故事，没齿不忘。

黎老师在云阳碛村电站工作，离县城十五里的汤溪河畔，地处农村。他认识附近生产队一个“知青”，虽然生活艰苦，但经常在煤油灯下夜战，给《万县日报》写稿，报道农村的生产生活新鲜事，时而会收到几块钱稿费。钱虽少，买盐和煤油够了，解决了当时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大问题。同时，“知青”又锻炼了写作能力。

第一次听说写文章能赚钱，新鲜、稀奇，对我很有吸引力。陈老师说，你的作文写得不错，鼓励我试试，也给报纸投稿。那个时候我喜欢画画，一心想当画家，因此改变爱好，喜欢起写作来，直到现在。

初中毕业后那个暑假里，我收到《儿童时代》杂志社赠予的两枚纪念章，之前投了两篇文章参加他们的征文活动。文章虽然没被采用，收到纪念章心里仍然高兴，马上跑到学校，送给了陈老师一枚。1981年3月一天的《万县日报》上，我的文字终于变成了铅字。大约两个月后，收到八角钱稿费。这是我的第一笔稿费，为了花得有意义一些，便买了一叠书签，分送给朋友作纪念。当然赠送给了陈老师一张。

我自己留下的纪念章和书签早已不知去向。12年后，我出版第一本散文集，在扉页写上魏巍《我的老师》里的一句话：“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，多么公平，多么伟大的人呵。”当我恭恭敬敬地给陈老师送上这本小书时，她很高兴，仍像以前那样温柔、慈爱地微笑着说：“你送给我的纪念章和书签都完好地保存着。”

突然间，我想起老师的名字：陈阳灿——阳光灿烂！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# 流泪的天使

□赖永亮

那个阳光明媚的周一下午，班会课，我照例在讲台上宣布本周评出的5名优秀之星、5名进步之星。

十名被选上的孩子喜滋滋地上了讲台，小脸笑开了花。戴上奖章，孩子们抑制不住满脸的骄傲。轮到最后一名孩子时，我赫然发现，奖章——居然没有了。

“还有一枚优秀之星的奖章呢，上周谁没还给老师？”我问。

孩子们扭头四处寻找“罪魁祸首”，却始终没人站起来，大家都说还给我了。

少了一枚奖章，只能暂时减少评选名额，在大家的建议下，有一名孩子落选了。那是一个活泼聪明的男孩，课外知识非常丰富，上课回答问题特别积极，十分爱帮助同学，平心而论，挺优秀可爱的一个孩子，可就是有点小调皮，有时管不住自己。这不，午读时大概是没认真吧，大名正记在黑板上呢。于是，同学们一致决定，不选被记了名的他。

刚才还欢天喜地的孩子立刻如霜打了的茄子，蔫蔫地回到了座位上，小嘴一瘪，眼睛一眨，眼泪便一颗一颗地滚落下来。

我有些不忍。放学铃响了，我正欲过去安慰他几句，孩子却迎着我走了过来，哽咽着说：“老师……我来帮您收讲台……”说着，他便一边流泪，一边一丝不苟地把讲台上的书本叠放得整整齐齐，把一个个的粉笔头捡进粉笔盒里，又拿着抹布到水龙头前搓净，仔仔细细地抹起来，直到整个讲台干净得能照出人影，然后默默地再去将抹布洗干净，拧干，晾在教室门后的绳索上……

默默地看他做完这一切，我的心，立刻柔软一片，眼睛湿润了。我走过去，轻轻抚摸着孩子的头，柔声说着：“老师知道，你一直都是个好孩子。你是一名合格的优秀之星，我这就去补一枚奖章，明天你就可以戴上。”

我以为孩子会欣然接受，哪料，他却有些羞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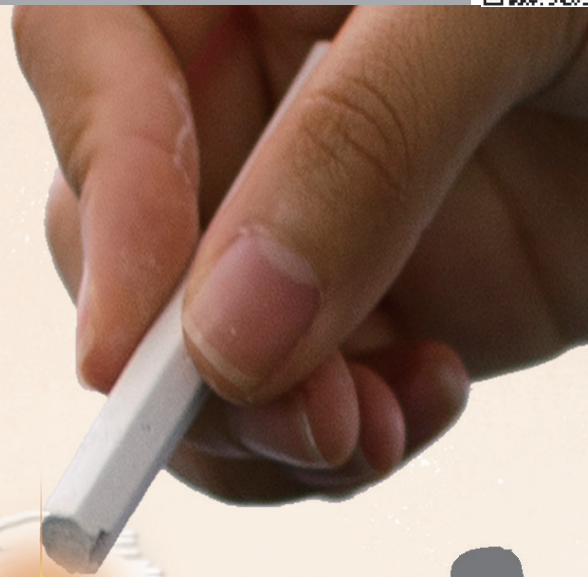
地说：“谢谢老师，不过这样太麻烦您了，不是每周都要评吗？我还是努力下周争取吧！其实，老师，今天中午是我的同桌没戴红领巾，我怕监督岗的同学扣我们班上的分，所以就把书包里多准备的一条红领巾借给了他。班长见我们在讲话，就把我俩的名字都记上了。”

我突然觉得很自责，身为班主任，我居然在没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轻率地下结论，差点委屈了一个如此纯真善良的孩子！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孩子在遭受不公平待遇时，毫无怨言，对老师，对同学，更多的是体谅与理解，并能继续将自己真诚善良美好的一面表现出来，这是多少成年人人都难以做到的啊！

我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，我要找出那枚丢失的奖章，因为，没有谁，比这名孩子更配戴得上它！

然后，我真找到了，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角落。我郑重地将奖章戴在孩子胸前，孩子那还挂着泪珠的小脸，立即花儿般灿烂地绽放！

（工作单位：重庆市荣昌区棠香小学）



# 初为人师

□向墅平

其实，我并非师范“科班”出身。当年奔走求职时，却阴差阳错地踏入了教育部门，并以一大沓念书时赚得的烫金荣誉证书，赢得一所乡村中学老校长的“芳心”，做了一名当地的人民教师。

初上讲台。我携着初出茅庐的热情，很激情地口若悬河，很洋溢地唾沫飞溅。为体现我的高高在上，以及我的磅礴大气，我几乎不下讲台，也一般不拿正眼给台下那一群孩子，甚至不给他们张嘴的机会——我就那样一厢情愿地自圆其说，兀自发挥。初始，台下像没人似的寂寥无声。我心里犹自得意：哼，凭我灌了十数年的墨水，对付这些娃娃，不过小菜一碟，他们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。可这样的状况，并未保持多久。讲着讲着，某个角落便率先发出窸窸窣窣之声；进而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至全场。我试图以我的声势，压住台下。我用更高的分贝，更激情地讲课，不，唱独角戏！可水涨船高——台下的聒噪声也愈加热闹。我的自尊受到挑战。义愤填膺之下，我猛地伸出手去，“啪”一巴掌拍打在刚硬的讲桌上——哟，好疼！这不啻一记霹雳。台下倏然归于死寂。可不一秒，台下复又一片蛙鸣虫嘶之声。

无计可施，为了挽回点师道尊严，我只得罢课。

有那么一个晚上，我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。我甚至想一走了之，离开这些让我身心疲惫的学生娃！可我脑海里，却又始终浮现着老校长那深邃坚定而又大慈大悲的眼神。他对我有知遇之恩啊。我理应拿出行动来证明给他看：他老人家没看错人！

经过一夜痛定思痛，我琢磨出新招：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；既然“暴力手段”不服众，何不改用“怀柔政策”呢。思想指导行动。我便开始和那些孩子套近乎，并打成一片。课外时间，我跟他们在一起打篮球、掰手腕、开玩笑。我们慢慢混淆了师生界限：我成了他们名副其实的“娃娃头”。本以为，这样便可改善课堂；然而我错了，错得一塌糊涂。当回到课堂，那个糟啊，更有甚于从前！

“硬”的不成，软的“无功”，我无计可施啦。关键时刻，老校长救火来了。他亲自掇一把凳子，坐到我的课上，给我“压堂”。或者，他会在我上课时，不定时地用他那极具威慑力的眼睛，从教室窗玻璃前往里扫望。如此一段时间后，我的课堂秩序，才趋于正常。一日，休息时，老校长背着手儿，踱到我的单身宿舍。老校长用沧桑，不用“姜是老的辣”那种眼神，瞅着我，与我促膝谈心。老校长一声喟叹：哎，当初见到你那一沓荣誉证书，听到你那一番夸夸其谈，还以为你是个教书的料；可如今看来，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行啊！闻此言，我顿觉耳根火辣辣的，羞愧难当！老校长换了种语气，又对我循循善诱，谆谆教诲起来：你今后的路还长，咱也不可能一辈子帮着你；记住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那些学生之所以不服你，只因你还缺乏一个教师应有的气质，应有的风骨；教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，好好修炼吧，总有一天，你一定可以修成正果，步入正途。

岁月倥偬。往事不堪回首。而今，老校长已经退休。在教书这个行当里，我摸爬滚打数十年。正如一粒水边的糙石，历经无数次的浪打潮袭、长时间的浸润磨蚀，才会出落得玲珑圆熟，气韵幽美——教书育人，更是如此。

（工作单位：重庆万州武陵中学）

